

蒲鲁东劳动所有权理论的三维阐释及批判

贾淑品, 王新宇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劳动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对其劳动所有权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理想社会的雏形,认为这就是对“绝对平等”理念的最好回答。但以马克思的视角来看,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进行的分析虽然揭露了一些资产阶级统治的弊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并从权利归属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进行了分析,但仍旧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受压迫的本质,其所进行的分析与论证也不过是在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基础上的自我循环。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自我矛盾入手,才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与实质,并用实践性的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民被压迫的现状。

[关键词] 蒲鲁东;马克思主义;劳动;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4)02-0005-12

长期以来,对于蒲鲁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研究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思想的批判以及超越的价值,认为蒲鲁东的思想已经被推翻,理应研究马克思在批判与超越蒲鲁东思想时所展现的新论述与新观点。二是研究马克思对蒲鲁东态度的转变以及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所进行的吸收与借鉴,尤其是蒲鲁东某些观点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启发。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蒲鲁东劳动所有权理论进行探析,并不是为了重新为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进行“招魂”,而是要厘清蒲鲁东论证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及呈现出的一些特质。事实上,对于蒲鲁东这位对社会主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只有了解其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如何论证自身思想的正确性,才能明白为何这些思想如此充满迷惑性与煽动性,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剖析与批判的价值。

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其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批判,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被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最卓越的代表”。其作品《什么是所有权》对其所认为的私有制与对私有制的维护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1]。马克思从接触蒲鲁东开始便对蒲鲁东的思想秉持着“谨慎而尊

[收稿日期] 2023-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帝国主义本质研究”(23&ZD327)。

[作者简介] 贾淑品(1975—),女,安徽砀山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王新宇(2000—),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重”态度进行研读与批判,从《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公开的批驳,再到《论蒲鲁东》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盖棺定论,马克思始终重视对蒲鲁东思想的辨析,而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则被马克思称为“其最好的著作……至少是由于大胆新鲜讲述旧东西的风格而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2]28}。而蒲鲁东对劳动所有权的论述作为此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与研读,尤其是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与工资的关系以及劳动与社会的平等方面的论述在如今仍有探究的价值。

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以“劳动是所有权的动因”与“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两部分对其劳动所有权思想进行了集中论述。蒲鲁东论述劳动所有权的逻辑是:首先以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论证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讨论生产资料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分配问题以及其所引出的劳动报酬分配问题,最后,在证明现实的种种不合理性后提出自身的解决方案即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构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劳动与工资的关系、劳动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对蒲鲁东的劳动所有权理论进行阐释的三重维度,同时也是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批判与超越的三重维度。

一、不可被拥有的土地:蒲鲁东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理念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对劳动所有权的讨论首先要进行的便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论述“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时首先说明“所有制的最初形式……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3]211} 马克思认为所有权的诞生是以对土地的占有开始的。同样的,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描述与论证也是以土地为典型案例进行展开的,这也符合贝尔多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一种对农民的社会主义》中对蒲鲁东思想的论述。

在分析与批判萨伊与孔德思想的基础上,蒲鲁东通过自身的逻辑论证指出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能因先前的占有、普遍的承认、较长的时效与劳动的创造而获得,这与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致。二者都对大资产阶级与地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了批驳,虽然在根本观点很难称得上契合,但蒲鲁东在论证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思想仍值得辨析。

(一)从理论批判到逻辑分析——蒲鲁东对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可被侵占的论证

蒲鲁东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可侵占性”论证是通过批判以萨伊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为始的。在蒲鲁东看来,萨伊等人通过论证土地因其具有固定、有限且排他的属性就将其所有权作为可被获取的表述是“粗率的、模棱两可的”。因为虽然“一种像土地那样有限度的和不动的东西比水或阳光提供更多的被私有化的机会”^{[4]121},但其“有限度”与“不动性”的特点并不能被当作可以被占有的条件。在这里,萨伊与蒲鲁东都引入了“四行”的概念,即阳光、水、空气与土地,而蒲鲁东所反对的正是萨伊将土地因其可以被占有便将其进行占有的行为。

在批驳萨伊论证上错误的同时,蒲鲁东也按照萨伊等对所有权做辩护的政治经济学家的逻辑进行了继续论证:在土地的创造者——自然或上帝没有售卖土地而是进行赠送的前提下,可以认为“创造者在进行赠送时并不考虑被赠送人的身份问题”^{[4]122①}。既然如此,则在遗产继承时也不应考

① 原文为“但是土地的创造者并不出卖土地,他是把它送人的,并且在他赠送时并不考虑受赠人的身份问题。”

虑嫡子与私生子的身份问题,继续推导以后蒲鲁东提出在此基础上可以质疑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所有权关系的转换问题,从而对整个社会关系进行否认。

除了对萨伊的“可行性理论”进行批驳的外,蒲鲁东也对孔德的“有限性理论”提出质疑。在蒲鲁东看来,孔德所提出的“因为土地不是无限的,因而应该被私有”^{[4]124①}的观点同样存在错误。孔德认为,“有些东西数量很多,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他东西数量较少,只能满足某一数字的人们的需要。前者被称为共有的,后者被称为私有的。”^{[4]125}而蒲鲁东认为这样的论证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即“水、阳光与空气之所以公有不是因为取之不尽,而是因为不可或缺”^{[4]125},换言之,蒲鲁东认为土地非但不能因其有限而对其进行占有,反而因为其不可或缺性而不可被占有。在土地的使用上,蒲鲁东提出对土地应该进行有节制的使用,并且是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为目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论证得出“社会的主权与个人的所有权是对立的”^{[4]125}。

在论证生产资料不能因占有而获得后,蒲鲁东同样对所有权通过普遍的承认即可获得合法性进行了证伪。蒲鲁东的观点认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已经做出了“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5]的观点,并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如果自由权不能被抛弃,则劳动权也不能被抛弃,如果人们承认一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就是放弃了自身对土地的所有权,放弃了自身的劳动权(因为抛弃了自身的生产资料),这同样与人的本质所不相容。

因时效而获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样受到了蒲鲁东的批判。在这一观点上,蒲鲁东直接对“时效性”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驳斥,在蒲鲁东看来,时效本身“就是为了阻止人类走向真理和为了维持对错误的偶像崇拜而散布在思想上的致命魔咒”^{[4]127-128},对时效正义性坚持的行为本身就是用时效来对抗理智和事实,是“历代保守分子的象征”。在对生产资料(土地)因时效而获得所有权的问题上,蒲鲁东引用了前文的论证,指出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而如果承认其因时效而获得了正义性,承认时间的推移可以把占有人变为所有人时,就是承认一种权利可以在没有产生的原因下被创造出来。

蒲鲁东在不承认先前占有、普遍承认与时效性而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同时,也对劳动获得所有权的理论进行了否定。在蒲鲁东看来,权利要在占有的前提下产生,而占有不能创造所有权,因此在没有占有的情况下进行劳动是无法创造权利的。蒲鲁东举了一个劳动所有权理论者的观点作为例子:“在一块土地产值为1的情况下,一个人通过劳动使其产值增加为2,这一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财产。”^{[4]141②}对此,蒲鲁东称他同意这一劳动者可以获得双倍的收获,但“他对土地却不能得到任何权利”^{[4]141}。因为因劳动者的能力而使其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其他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权利的剥夺,是对其他劳动者权利的侵害。

(二)目的、特质与方案的迥异——蒲鲁东的论证归宿

蒲鲁东作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对当时大资产阶级与地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通过法理上的逻辑推断对其合理性进行了驳斥,其在这一观点上与马克思的态度相同,即批判资本家与地主对生产资料的非法占有,但蒲鲁东与马克思进行批判的目的与表现出的特质并不相同。

① 原文为“土地在数量上是有限的;所以,按照孔德先生的说法,它是应该被私有的。”

② 原文为“一块特定的土地只能生产出供一个人一天的消费量;如果占有人用他的劳动设法使它能够生产两天的消费量,那么他就把它的价值提高了一倍。这个新的价值就是他的成就、他的创造;它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抢来的;这是他的财产。”

其一,二者的本质目的并不相同。马克思的批判是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理论依据,而蒲鲁东则是以批判大资产阶级的方式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提供支持。在论证过程中,蒲鲁东在某些观点上呈现出与马克思观点的相通之处,例如其所提出的“抛弃劳动权与抛弃自由权一样,都是与人类本质所不相容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都看到了劳动对人类的核心价值。当然,二者对“劳动”这一的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只是在其作为人类本质性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其二,蒲鲁东论证生产资料所有权过程中的一些表述所展现出的缺乏实践性的特质同样需要进行明晰。在论证生产资料不可因侵占而获得所有权的过程中,蒲鲁东根据逻辑关系在“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反证”下论证了当前社会关系在法理上的不可存在性,但并未指出这个“任何所有权关系都不应存在”的社会应当如何被改变。事实上蒲鲁东的思想体系始终缺乏一种实践性的特质,与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不同,蒲鲁东对其自身所进行的研究更关心的“是建立一种学说而不是去解释一些事实”^{[4]15},蒲鲁东本人也有过“我已证明了穷人的权利,我已指出了富人的霸占行为。我要求审判;判决的执行与我无关”^{[4]22}的表述,因而实践性的缺乏始终是蒲鲁东思想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三,蒲鲁东与马克思对生产资料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相同。在蒲鲁东批判孔德以证明生产资料不因其“有限性”而具备“可占有性”后,蒲鲁东得出了他的结论,即土地的所有权不应被私人所占有,并且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被有节制的使用,并进而推导出“社会的主权与个人的所有权是对立的。”这一结论无疑是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显著体现,但其无法回答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在被集体“有节制的使用”的过程中“集体”的存在方式问题,即生产资料公有状况下监管者身份的缺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蒲鲁东提出批评,认为蒲鲁东在分析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整体性,与此相反,“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证明……而当时这些关系在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3]223}。在以劳动获得生产资料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应当采用公有的方式,采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蒲鲁东则做出了劳动者不能因劳动而要求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论,对此蒲鲁东提出了“互助主义”的思想,即各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订立契约,并等价交换彼此的产品。“人人劳动,自发组织,公平交换。这个互助性社会也是蒲鲁东无政府(Anarchy)理想。”^[6]尽管蒲鲁东公开主张其反对私有制,但这一思想却是明确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因为这一方案在事实上就是对生产资料进行碎片化的所有权划分。蒲鲁东的方案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所相违背的,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对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要求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状况下才可能进行,而无法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发展。

二、财富的获取与流动:从驳斥劳动购买到建立平等分配

在蒲鲁东看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论证完成后,就需要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进行论证,即劳动报酬与工资分配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产品的所有权问题是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蒲鲁东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在劳动与工资的关系上,蒲鲁东与马克思一样都发现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其自身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他对他所创造的价值有所有权,而现在却只有雇主可以从这个价值

中得到利益。”^{[4]145}而这份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多出来的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的”“没有任何劳动的”所占有。为了阐明劳动与工资的关系,蒲鲁东采取了两个角度的论证,并提出了自身对劳动报酬分配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代价交换与劳动日购买——蒲鲁东所论述的劳动与工资关系

为了证明劳动者没有丧失对自身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并对劳动与工资的关系进行说明,蒲鲁东提出了他的思想:劳动者即使在领到了工资以后,对他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保有一种天然的所有权。并采取了两种证明的方式:

首先,蒲鲁东驳斥了“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以换取工人的劳动”的说法,表示这样的代价是“远远不够的”。^{[4]146}①在蒲鲁东看来,工人们已经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在这里,工人是劳动了的,而资本家是没有经过任何劳动的。资本家所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作为工人劳动必需品的供应,即便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其他的作用,那也只是能够取得劳动产品的一部分权利,而不能剥夺和损害工人的权益,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只是工人的同事而已。在前文中,蒲鲁东已经对其“任何人不能通过侵占获得所有权”的理论进行了说明,因此他又在这里指出,资本家所“用来支付劳动者工资的钱,仅足以和工人们放弃给您的永远占有的几年中的所得相抵。”^{[4]146}

而后,蒲鲁东又对“资本家购买劳动日”的说法进行了反驳,称“资本家每天雇佣的人数就是其所购买的同一数量的劳动日”的说法同样是在混淆视听。^{[4]150}②在这里蒲鲁东举了一个例子:两百个人用一天的时间可以容易的将方尖碑吊装到基座上去,但一个人用两百天的时间则绝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但对于资本家而言,雇佣两百个人一天的花费和雇用一个人两百天的花费却并没有什么不同。换言之,“对于劳动者团结协调和群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的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何报酬。”^{[4]150}对于社会生产而言,从开办一家工厂到平整一块土地都需要种类繁多的劳动与技巧上的互相协调,但并没有资本家为集体的力量付出任何多余的酬劳,工人所得到的工资仍旧是按照单一工人的劳动日发放。

显然,马克思与蒲鲁东都看到了工人劳动对社会财富创造的原始作用,也都明确感知到了资本家对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进行的巧取豪夺,但二者为证明工人劳动与工资报酬的关系所采取的方案并不相同。马克思所采用的是“剩余价值学说”,^[7]将工人的整个生产活动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时间,指出资本家所支付的工资仅相当于必要劳动时间内的劳动报酬,而无偿取得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是用工资来掩盖剥削;蒲鲁东则采用了“工资仅作为劳动者劳动过程中必需品的供给”与“资本家并未偿付集体协作所带来的价值”理论进行说明。在工资的分配额度上,马克思与蒲鲁东两人也都看到了劳动报酬的多少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要求:1、劳动者自身的维持;2、新的劳动力的生育和培养。劳动力再生产在优势、劣势、等同条件下,存在扩大再生产、萎缩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不同区分。^[8]而这个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所决定的;蒲鲁东则认为,资本家在雇佣工人时必须“维持他的生活或者给予等值的工资”^{[4]150},此外,“除了他当前的生活必需品之外,劳动者必须能够在他的产品中保证得到他将来的生活必需品”^{[4]150},否则生产的源泉将会枯竭。可以看出,虽然表述上不相

① 原文为“这个代价是不够的,工人们的劳动已经创造了一种价值;因而这种价值是他们的财产。”

② 原文为“有人说,资本家已偿付了工人的劳动日;但为了确切起见,应该说资本家每天雇佣了多少工人,就偿付了多少个劳动日,这与上面的说法就决不是一回事了。”

同,但二者都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所获报酬是否足够当前劳动力的维持与未来劳动力的创造这两个层面。

联系到二者所处现实环境中,两人都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的窘境。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萎缩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常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如果生活资料不能够使劳动者个体在同样的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劳动力就会出现萎缩状况。”^[8]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则使得工人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9]43};在蒲鲁东看来,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酵母——生命的萌芽与生产手段的准备”成为“资本家对生产者欠下的从未偿还的债务。”^{[4]151}这种欺诈性的行为造成了劳动者的赤贫与有闲者的富有以及二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简而言之,马克思与蒲鲁东都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十分困难并且将越来越困难。

(二)同一现状下的不同道路——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分配理论的殊途

既然二者都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而劳动报酬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又如此之重要,那么如何进行劳动报酬的分配便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劳动财富的分配,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按劳分配的不同态度以及自身所倡导的分配方式所对应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提出应当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下的按需分配为最终目标,而在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则应当重视按劳分配的作用,以此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蒲鲁东则完全反对按劳分配的方案,他称圣西门、傅里叶所提出的“按才分配、按才配工”与“按照个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实质上只是“把地球当做了一个广大的决斗场”^{[4]155},只不过将用来决斗的武器从武力与奸诈换成了智慧与品德。在蒲鲁东看来,每个人的才能与天分是注定不可能相同的,所以“按才分配、按才配工”只是将天然的不平等用制度的方式进行了确立,“使社会的不平等永远与天然的不平等相符合。”^{[4]155}

蒲鲁东认为,按劳分配的方案实际上忽略了劳动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协作和可以利用的材料(即生产资料)。在蒲鲁东看来,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是平等的,如果对其中的个体因劳动能力更强而给予更多的报酬,而这个报酬又是劳动者们联合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对这个个体的奖励就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在这一条件下,即使土地像阳光、水和空气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同样不能采取“多劳多得”的方案,因为对“多劳者”的奖励仍然是联合生产下的产品,“凡是完成了他的事业的人最后都能得到报酬;首先到达终点是没有必要的。”^{[4]159}对此,蒲鲁东所倡导的分配方案则是一种绝对平等的“工资平等理论”:他首先承认人和人的才能是不均的,但他以自身的逻辑提出了“才能的不均正是财富平均的必要条件”的口号,在蒲鲁东看来,一个人才能的发挥离不开整个社会集体的帮助,而将一个人先天的才能变为切实的生产能力的知识“正是无数大师在无数低级事业的支援下积累起来的”。^{[4]178}因此,类似科学家或者艺术家这样有才干的人所获得的报酬只能是对其不能从事生产与实业活动而进行的补偿,而其不能要求任何更多的权利。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对蒲鲁东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3]61},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方案只是一种一厢情愿,仍旧是一种“特殊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蒲鲁东的方案中,社会扮演了抽象资本家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与蒲鲁东所提出的分配方案不同的同时,其与分配方案所对应的社会形式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所提出的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

社会,而蒲鲁东所提出的“工资平等理论”则对应其所倡导的小私有制下的社会。在工人所获得劳动报酬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着眼点是一致的,两人都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现状,并尝试去分析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所提出的工资平等理论并没有看到工资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说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就认识到工资问题的实质乃是劳动问题,异化劳动是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本原因。”^[10]而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对私有制的消灭与异化劳动现象的消除。

三、劳动与所有权的消解:蒲鲁东所构想的平等社会

在论证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合理与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合理后,蒲鲁东将矛头对准了其所认为的问题根源,即所有权本身。在蒲鲁东看来,所有权是由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而随着社会形态向无政府主义变更,所有权本身也将会消解,蒲鲁东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也将到来。

蒲鲁东对其所最终追求的平等的论述是从劳动开始的,从劳动问题到分配问题,再到所有权的消解以达到最后的平等。换言之,所有权作为导致不平等的唯一因素,其本身将在劳动下被消解。这一观点也是蒲鲁东论述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工资分配后所要得出的结论。而在蒲鲁东对其所有权终将消失的理念进行表达后,他还对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形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这一切都建立在以劳动为动因的所有权消解之上,也就是蒲鲁东所提出来的“劳动破坏所有权”。

(一)平等的崩塌与维系——蒲鲁东平等观下劳动对所有权的破坏

蒲鲁东的推论与证明都是在其秉持自身正义观的基础下进行的,而蒲鲁东的正义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其对于平等的理解。在《什么是所有权》的序言中,蒲鲁东对自身的论证方法进行了说明,他声称“全部工作的主题”都是以“正义的观念”来进行辨析,而蒲鲁东的正义观中平等又是其所非常重视的一部分,他宣称“平等是必然的定律;绝对的形式;在一切关于所有权的学说中,所有的人,甚至背离它的时候,都在不知不觉地服从着它。”^{[4]2}而蒲鲁东对于平等的理解同样值得注意,他所认同的平等是一种抽象的“绝对平等”,“如果平等不是绝对的话,就没有平等。”^{[4]162}在明晰了蒲鲁东对于平等的理解后,便可以对其从劳动到所有权的消解的论证进行解读。

蒲鲁东对劳动创造平等的论述首先从批判圣西门与傅里叶主义者“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观点为始,并在之后提出了自身的“工资平等理论”,这一点在前文中已有表述。但在面对“多劳者”自身所拥有的才能所带来的更强的劳动能力时,蒲鲁东对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了承认,并且蒲鲁东自身所秉持的绝对平等主义观念使其无法对这些更有才能的人进行劳动的意愿进行否定,为了避免这种矛盾,蒲鲁东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在第一种方案中,蒲鲁东提出这些劳动能力更强的人在完成每个人所应该完成的劳动份额后,可以去更早的休息,亦或者在不妨碍其他人的情况下进行锻炼或思考,甚至可以选择继续劳动。但劳动的产出不能用来进行交换,因为交换所获得的产品是“其他劳动者的产出”,所以一旦他将这些多余的产品用于交换,就是对其他劳动者的不公。

第二种方案实质上是对其第一种方案的延续与补充,只不过蒲鲁东在此处采取了社会层面的解决办法。蒲鲁东提出,社会应当根据社会需求为每一个劳动者安排等额的任务量,并且只对自身所安排的劳动任务进行酬劳偿付。为了证明这一方案的可行性,蒲鲁东以其自身所从事过的印刷工人的工作进行了举例说明:在印刷业中,每天的工作任务可能是繁重的也可能是清闲的,在任务

量大的时候,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多劳多得以求尽早完成任务;而在业务清闲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将自身的任务进行平分,以确保每个工人都能得到基本的劳动报酬,“如果有人不把自己的工作分给别人的就被看作是盗贼和叛徒一样,为人所不齿。”^{[4]160}那么如何保证每一天的劳动量都能够以清闲的形式存在呢?蒲鲁东提出的证据是:“人们曾经计算过,如果按照法国具有劳动力的人数来分派工作的话,每人每天平均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小时。”^{[4]160}而之所以现状并非如此,则是因为所有权的存在与分配的不公将人分为了劳苦者与清闲者。换言之,蒲鲁东认为自身的方案是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基础的,并且随着劳动者协作与联合的生产不断发展,每个劳动者达成社会需求任务的劳动时间与劳动量将会越来越低,其方案的可行性也会越来越高。

基于自身所设想的方案,蒲鲁东提出,如果社会只对其所提供的劳动进行偿付,就可以公平的对待所有劳动者。如果协作劳动的范围越大,社会所提供的劳动总量就越大,天然的不平等也将会逐渐消除,因此所有权是唯一能够带来不平等的因素,劳动也是消解这一不平等因素的动因。

但在现实中,劳动报酬分配并不只参考“多劳多得”的原则,资本在报酬的分配中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蒲鲁东的方案中,他也对资本这一要素进行考量,在面对傅里叶主义者“按照各人的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4]154}的口号时,蒲鲁东首先对资本在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提出了质疑:“首先应当把资本从应当得到报酬的因素中删去。”^{[4]156}他提出资本只能根据占用权为其所有人生产生收益,而根据蒲鲁东的论证,生产资料本身的所有权无法被获取,因而资本无法发挥其产生收益的作用,只能作为一种交换,即资本无法增殖,也无法作为收入的来源。

除了通过平均分配劳动任务对所有权进行消解外,蒲鲁东还认为劳动产品的分配同样具有消解所有权的效力。前文中已经说明蒲鲁东意识到了劳动报酬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报酬若没有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就会使劳动力再生产陷入枯竭。但他也指出事实上资本家所给予工人的工资很少超过其日常消费量,并且无法对第二天进行保证,资本家本身的安全性与独立性却能在劳动者的生产中得到保证。

蒲鲁东认为,面对问题资本家必须选择三种解决办法:1、在支付工资后与工人分享劳动产品;2、资本家为工人提供等值的劳务;3、资本家保证永远雇佣劳动者。在蒲鲁东看来,后两者资本家显然无法满足,因而只能选择第一种办法进行财产分割,这一过程中一切都将趋于平等,所有权也将消失,“将来既不会有大的资本家,也不会有大的所有人。”^{[4]152}

具体到实际的生产之中,在蒲鲁东看来,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社会中每一个劳动者的生产都是在其他集体劳动者的生产之上进行的。劳动者对自身所生产产品的所有权,在产品生产出来后被抵押给了其他劳动者,同时其自身也拥有其他劳动者产品的所有权。这种互相抵押的行为不但在事实上否认了所有权,甚至破坏了占有权,因此所有权便在社会的集体劳动之中被破坏了。

蒲鲁东所提出的劳动所有权理论,是以其自身的正义观为出发点的,通过其自身所强调的绝对平等理念来对劳动与所有权的关系进行论证,最终得出劳动将消解所有权的结论。为了与这一理念相匹配,蒲鲁东又根据其绝对平等理念从对包含劳动、生产、消费与交换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划,以求达到他心中所追求的“建立在‘公共正义’而非‘私人正义’基础上的未来社会。”^[10]

(二)空中楼阁中的无用功——马克思眼中蒲鲁东所认为的劳动对所有权消解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所追求的绝对平等下的劳动与在此之上对社会的种种规划实际上都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幻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蒲鲁东对于其劳动所有权的论证与说明不可

谓不“绵密”,其在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归属、劳动与工资报酬关系以及在劳动对于所有权的消解与理想社会的建立这一逻辑推理上层层递进,形成了一套对其自身而言“自洽”的论证理论。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对蒲鲁东的思想批判首先就应该跳出这一套环环相扣的自我逻辑,而应该从其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与方法上对其进行批驳,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寻章摘句式的批判并未进入细节,而是集中攻击其‘科学的发现’和形而上学的方法。”^[6]这一方法同样能够用来对蒲鲁东“劳动消解所有权”的观念进行驳斥。

其一,蒲鲁东的论证呈现出系统性哲学理念的缺乏。蒲鲁东的哲学理念大都来源于自学或道听途说,蒲鲁东“对哲学太陌生了,只能把德国的哲学精神理解为非常表面的、形式化的‘二律背反’或三段论式的‘辩证法’”。^[6]蒲鲁东所论述的劳动所有权理论以及其在论证过程中所秉持的绝对平均主义理念“仍然局限于黑格尔主义的思想逻辑之中”^[10],是一种在“绝对平等”理念下不断自我论证的幻觉。在论证劳动将消解所有权的过程中,蒲鲁东根据自身设想对人性进行了想当然的预设,将人性当作了一种在不同环境下都保持一成不变的概念;在设想理想社会的过程中,蒲鲁东又将大量的笔墨放在了描述自身理想中社会的细节与运转上,而忽略了在劳动将所有权破坏后社会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而是将这些难以忽视的改变当做了理所当然。马克思评价蒲鲁东的论证时表示:“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11]607}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思想都是在其脱离实际的思想基础上所进行的,蒲鲁东所论述的劳动平等以及劳动对所有权的消解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建立在客观的现实上,而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上,正因如此,马克思评价蒲鲁东的论证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其二,哲学方法的问题使蒲鲁东的论证带有明显的预设立场倾向与先验论色彩。在通过社会现状进行举例以说明劳动将导致所有权消解的过程中,蒲鲁东明显的感知到了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从其自身对于劳动报酬分配的态度来看,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明显认识到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但蒲鲁东在阐述其劳动所有权理论时所设想的平均主义、自愿签订、互助联合这一解决方案显然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与小生产者立场上的回答,这位“当时法国无产阶级最卓越的代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不平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不平等。在资产阶级社会与无产阶级社会的选择之中,蒲鲁东所追求的是“第三种社会形式”,即“一种‘综合’共产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4]4}而在改变社会现状所采用的手段上,“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甚至认为工人罢工是违法的,认为不必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仅仅通过经济改良就可以实现社会变革”^[10],换言之,蒲鲁东将其认为的所有权消解后的社会改变当做了一件毫无曲折性的事情,这种软弱性以及对社会状况的偏差认知与其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是分不开的。

其三,除了哲学方法上的问题外,蒲鲁东的理论还存在事实根据的错误与自我观念冲突的矛盾。蒲鲁东对劳动将破坏所有权的论证相当重要的部分是建立在对概念的错误理解上的。例如,蒲鲁东狭隘地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按才分配、按才配工”理解为将资源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更多的向有更强能力的劳动者倾斜,但事实上,这一理念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含义是“能者多劳”,即将更好的生产工具交给能力更强的劳动者,使合适的人走上合适的岗位,而并未将主要的论述方向放到报酬分配与正义问题上。其论述的方案与其所追求的社会形式同样存在矛盾。蒲鲁东所认为的劳

动消解所有权需要让社会为每个劳动者分配平均任务量、禁止“多劳者”的多余劳动与社会产生交换,并将这一方案的现实基础建立在协作劳动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上。联系这一方案与蒲鲁东所追求的社会形态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达成蒲鲁东所说的条件需要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对社会分工与协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倘若社会按照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所有制运转,生产资料被碎片化的切割,那么更大范围的协作就无法进行。此外,蒲鲁东要求对社会需求的任务量进行分配,并实际确保每个人都能将劳动任务进行均分,还要求多劳者的产品不被用来交换。既然如此,其所设想的社会中对这一职能进行实现的角色便成了实质性的政府,这与蒲鲁东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是矛盾的,因此蒲鲁东所设想的方案也就成为空谈。基于对蒲鲁东理论与观点的分析与评价,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11]617}

四、吸收与批判:马克思对蒲鲁东劳动所有权思想的超越

通过梳理蒲鲁东的劳动所有权理论并分析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并结合马克思对蒲鲁东前后态度的转变可以得出:马克思正是在吸收与批判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蒲鲁东的超越。具体而言,蒲鲁东的思想与论述在资本主义背景下,从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劳动与工资报酬的分配上对大资本家与大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与揭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社会构想。蒲鲁东在论证过程中所展露出的思辨精神以及其对于劳动的看法在受到马克思的批判的同时也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一定程度上“蒲鲁东的平等原则抓住了法国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由此应当承认蒲鲁东的贡献。”^[12]但应看清蒲鲁东思想论述的最终目的仍是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追求进行辩护,也要看到蒲鲁东论述过程中所表现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对蒲鲁东自身的立场,马克思称“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13],而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吸收与超越,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呈现:

其一,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思想的超越是阶级立场上的超越。蒲鲁东比马克思更早地活跃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舞台上,他的一些观点和论述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提及蒲鲁东时称“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4]此时的马克思与蒲鲁东在不少问题的研究方向上都不谋而合,但随着马克思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方式的理解程度不断加深,他敏锐的察觉到了蒲鲁东在不少问题上论述的错误性。具体到劳动所有权问题中,在论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上,蒲鲁东尽管指出了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存在的不合理性,但其对“真正合理”社会的构想与其所宣扬“互助主义”要么与事实相悖,要么在自身的逻辑上相矛盾。马克思认为这些错误很多都根源于蒲鲁东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此时的马克思“一方面吸取和保护蒲鲁东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经常指出他的缺陷,希望他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15]但随着二人矛盾的不断加深以及最终的分道扬镳,这位被格律恩称为“法国的费尔巴哈”的蒲鲁东先生最终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相行渐远。在所有权的问题上,同样以批判地主与资本家作为现实出发点,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超越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对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超越。

其二,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思想的超越是政治经济学上的超越。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缺陷是由时代背景与个人水平两方面导致的:在时代背景上,蒲鲁东所处的法国正是经历了大革命动荡之后的法国,反复的革命与复辟使蒲鲁东对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感到失望,转而主张阶级和解,在这一条件下,蒲鲁东尽管对资本家攫取劳动者的利益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却反对劳动者站出来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对社会的根本态度上,蒲鲁东认为“通过排斥和侵占而起着作用的所有权曾经是产生一切革命的根源和决定性的原因。”^{[4]283}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基础是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而自己的劳动所有权理论则从所有权自身的矛盾中找到了所有权不可存在的基础,这足以动摇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在个人水平上,蒲鲁东始终都未能脱离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视野,他始终以一种极其狭隘的眼光去看待产业的发展,在这种视角下,“他的劳动者主体是产权清晰、产品单一的个体生产者或农村作坊式的小型集体生产者,而互助交换的规模小到甚至可以取消货币。”^[6]因此,未来平等社会的建立应当减少交换甚至限制交换。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超越之处在于他并不幼稚地认为理论基础的动摇能够影响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实,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1]11},而未来社会也必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分工与充分的物质交换上。

其三,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思想的超越是哲学思维上的超越。马克思对蒲鲁东在阶级立场与政治经济学上的超越,本质上根源于哲学层面的超越。蒲鲁东自身并未经受完整而规范的哲学教育,因此他对黑格尔与其辩证法思想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从旁人口中的转述与道听途说。蒲鲁东自以为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实质上他所掌握的只是“自以为是的黑格尔辩证法”,这一点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前两点超越上有着的具体表现:在阶级立场上,蒲鲁东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以这一立场为出发点来论证其所处的社会在所有权方面的不合理性,换言之,蒲鲁东的问题在于首先确定了立场,而后为这一立场进行寻章摘句式地论证与辩护,而马克思之所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则是因为其通过一系列的论证与研究证明了无产阶级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也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因此才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政治经济学上,蒲鲁东认为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贫穷与不公,是因为所有权的问题被掩盖了,只要揭露其中的本质,社会就会有所改变,而马克思则指明“经济范畴是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的结果,而非社会关系发生的原因。现实中交换的混乱和不公不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经济学规律抑或错误地落实了经济范畴,而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6]无论在阶级立场上还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蒲鲁东都试图用辩证法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证明,但其先入为主的预设条件却适得其反地将其扭曲为了形而上学,在哲学层面上,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超越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对于蒲鲁东的思想内容的分析与批判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上,蒲鲁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对自身思想的论述上,他也不乏精彩的论证与说明,作为一个影响了马克思一生的重要人物,蒲鲁东的理论对法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只有在了解蒲鲁东思想实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超越性的意义所在,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批判于我们而言才更有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梅林.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M].何清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 [4] 蒲鲁东. 什么是所有权[M]. 孙署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 [5]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6] 林钊. 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J]. 山东社会科学, 2018(3).
- [7] 胡芳.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批判与超越——基于《资本论》第四卷的考察[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2).
- [8] 殷林飞, 程恩富, 张国献. 马克思劳动者发展思想的逻辑机理与当代价值[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程彪, 李慧明. 工资平等还是劳动平等——从马克思对蒲鲁东工资平等理论的批判说起[J]. 晋阳学刊, 2019(1).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陈铮. 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关系的历史性解读[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56.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5.
- [15] 余源培, 付畅一. 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7).

(责任编辑:闫卫平)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Prutung's Theory of Labor Ownership

JIA Shu-pin, WANG Xin-yu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In *What is Property?*, Prutung elaborated on his labor ownership theor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wag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society, based on which he constructed the prototype of an ideal society and believed that this was the best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absolute equality". However, according to Marx, although Prutung's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exposed some of the drawbacks of bourgeois ruling and the darkness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nalyzed the opera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wnership of rights, he failed to see the essence of people being oppressed in capitalist society. His analysis and the argumentation he conducted are merely a self-cycle based on Hegelian idealistic dialectics. In Marx's view, only by starting from the self contradiction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n we recognize the prospects and essen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use practical means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ople being oppressed in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 Prutung; Marxism; labor; ownership